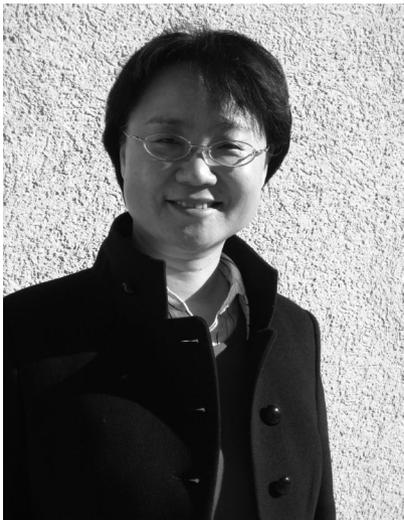


跨国岁月的人文之路

——颜海平教授访谈

● 颜海平 ○ 张 曦



● 颜海平，女，上海市人，1977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创作十幕历史剧《秦王李世民》并获1981-1982年全国优秀剧本一等奖；1982年毕业留校；1983年底赴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欧洲现代戏剧、比较文学和批评理论专业，1987年获硕士学位，1990年获博士学位。1991至2002年，先后在科罗拉多大学、密西根大学任教；2001年获终身教授。2003年出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中国艺术与媒体研究项目主任。2008年出任康奈尔大学戏剧电影系终身正教授、博导、康奈尔大学中国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戏剧、文学、电影与媒体艺术文化、跨文化审美与批评理论等方面的研究。在欧美研究领域中的主要英文论述包括《“等待戈多”：战后欧洲的价值危机和经典重构》《跨国性：战后诗学中边界地缘的叙述喻象》《当代英语戏剧中的跨界体现与女性人间》《别一种世界主义》。中国研究领域中的主要英文论述包括《现代中国戏剧与西方模式：中国主体性的批评重建》《戏剧能：中国戏剧审美传统的重访》，《跨媒介：当代中国电影的审美转向》《生之城：当代中国电影中的“家园”喻象》

《“我的梦”：跨文明境遇中的中华时空和差异认同》等。主要英语著作包括《戏剧与社会：当代中国戏剧》（1998）、《别样的跨国：散居的亚洲及其艺术审美》（2005）、《中国现代女性作家和女性主义想象：1905-1948》（2006）。中译本《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2011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论文集中文版《点灯的人：跨国岁月·学术随笔》2014年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新作《大迁移：跨媒介审美与当代中国艺术文化的兴起》，将由美国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和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中英双语出版。2011年起，作为上海首批千人计划特聘国际型专家落户上海交通大学，任上海交大媒体文化和社会发展高等研究院院长，跨文化研究讲席教授。2014年9月出任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主任、人文学院副院长，清华大学世界文学与文化研究院院长。

○ 张曦，学术月刊社编辑。

○ 颜老师，您好！很高兴您接受我们的访谈。这几年来我们的学者访谈一直集中在所谓的50后学者。你们这代人亲历了中国当代历史的大起大落，非常富于故事性，今天也想从你少年的生活学习的经历开始，好吗？

● 我的经历在这代人里相对单纯，上海出生，

幼年时的记忆明亮美好：绘画被选入国际儿童画展；去电台、电影厂录音；跟母亲学习念诵中国古典诗词；听父亲收集的外语唱片，等等。不过，“文革”前父母政治生活已经湍流汹涌，“文革”开始家庭直接受到冲击，外语唱片踩碎了，画册烧掉了；一夜之间，我成为一“家”之主：父亲隔离审查，母

亲去了干校，姐姐去了农场。一个人的日子里，我开始阅读父母亲留下来的所有书籍。高考时，只填了一个学校、一个专业：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就是富于传奇色彩的七七级复旦中文系，你们这个年级出了很多人物，都是已经或将要写进历史的。

●我那时在班级里只算“小同学”，我们班大家都爱阅读、爱写作、爱思考、爱论辩；许多全国性的争论和有影响的作品是从我们班开始的。卢新华的小说、胡平的诗歌、张胜友的散文、李辉的传记作品、陈思和的文论，还有春笋社的成立……这是一个需要想象力、也充满想象力的群体。

○那么您为什么选择了写历史剧？

●我在2011年的一次访谈中提到，“文革”刚结束时的民族虚无主义是个社会问题。我们通常意义上的现代是从“五四”时期的德先生赛先生开始界定的。而当时我的问题是，中国的传统精华中有没有内在活跃的现代元素，中国古典文化中，有没有内生的指向现代的资源？同时我还有另一层焦虑：当时对“文革”的反思，最有活力的部分已经超出对“文革”十年的言说，延伸到了对中国文化的不同时段和层面，对民族文化历史本身包括“国民性”的反思，十分激烈，非常重要。同时，在反思的思维方式 and 心智结构上，似乎又有一种“文革”式的惯性、逻辑上的重复，一种全面整体、一言以蔽之、扫荡性的倾向。我急迫地感到自己要学习、要补课，以求对传统和变革等问题做出一点自己的理解和判断，这种判断当然不可能是现成的，这样的学习也充满着深刻的焦虑和尖锐的困惑。我写《秦王李世民》的过程，就是希望对中国文明传统尝试着作一次重访、学习、探求，大量的史料和原典的阅读过程是一个补课过程和发现过程，是通过与历史的对话叩问以求对历史重新发现、进而重新把握的过程。这样的对话性读史、开放性叩问的学习探求，今天回顾，我感到大致上还是对的。

○这个剧得了很多奖项；后来您留校，然后很早就出国，能谈谈当时的情形吗？

●全国剧协剧本杂志社将此剧选入纪念改革开放30年全国获奖剧本选(《曹禺剧本奖获奖作品选》，2007)，可能是考虑到这个剧有过一点影响。当时我留校后，如何进一步学习有几个选择。出国求学，源于当时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先生对中国高校人文

发展的眼光和提出的要求，即中文系也要考虑送留学生。当我通过出国考试后，教育部和谢校长有过通话，询问这样一个留校任教的中文系青年，是否有出国的必要。当时谢校长说，现代中国作家里很多人，比如鲁迅、郭沫若，都有过留学的经历；中国的文科发展也要国际化，中国需要这样的人。谢校长本人是留美的卓越科学家，他们那代人亲身经历过战乱中国，在世纪的动荡中跨出国门进入国际学界，又亲眼看到了新中国的成立；他们心里最深的愿望，是祖国摆脱屈辱，赢得尊严，把自己所有的能力都交付给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建立和开拓。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他们就把自己原来对这个民族文化发展所抱的期待，放在你们身上了。

●或者说我们深受了他们的影响。教育部同意后，朱东润先生明确支持我选择出国。关于学术方面，他提出了三点：一是不要挑容易的路走。国外有非常利于学术研究的环境；但是如果到国外去学中文、教中文，回到国内讲外文、教外文，是挑容易的路走。第二，把别人好的东西学到手，来更新我们的事业。第三，一定要吃得起苦；吃苦精神一丢，爱国主义一丢，就一定亡国。当时的我太年轻，未必完全听得懂；而先生的语气在我心目中传递的信息和引发的直觉则是非常清楚的，就是要把握欧美正宗人文变革传承的力量所在。所以我一到康奈尔大学，选择主修的就是欧洲现代文学戏剧和以批判哲学为切入的19、20世纪欧洲思想史。我读研的导师Dominick LaCapra是美国文理院院士、欧洲思想史和人文理论界最重要的学者之一：他本科毕业于康奈尔大学的中世纪研究专业，在哈佛大学完成欧洲思想史和人文历史学的硕士博士，整个学术生涯是随着“二战”后世界格局转型、欧洲文化制高点的移位和美国飙升的历史过程而成就的。他是一位良师，也是益友；当我博士毕业执教十多年之后被特邀回康奈尔任职，他又是平等相待的同事。我是从他那里开始进入西方整个现代进程文化主流的源头区域和精神环境的；而他给予我最大的启示就是如何去批判性、分析性地把握这样一个主流及其历史变革。

○这样看来其实你的专业已经越出了文学，进入了一种文史哲互通的更大的领域。

●大家了解，在西方的现代知识生产中，几百年的理性传统强势奠基全面延续，使得学科分工明确严谨为正宗常态，文史哲专业分界学理严密，领

域知识长久积累，专业性非常强。我的这一位先老师、后同事的长者友人，他的学术路径和思想方法，是在高度分工、深度积累的专业能力传承之上，指向了对文史哲的全面参与和综合更新。在这里，跨学科研究不仅意味着在大跨度材料使用中——所谓文史哲的材料一起用——来探讨问题，更是对文史哲的既定属性和处理规则的开放性变革、对主题界定和专研领域的范畴性重组和通过这样的变革重组来提出问题、来更新直至创新提出问题的方法本身。比如，将柏拉图的政论作为语言学来阐释，将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作为哲学经典来分析，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作为史学诗学来探究，等等。当文学作品成为哲学阐释之案例，哲学作品成为文学领域之经典，史学作品成为文学性重建之路径，学术创新的巨大空间和可能就出现了。这样说未必就准确，但有一点我是清晰地感觉到的，即西学领域正在发生的这样一种跨学科综合更新，是我进入西学源头区域、精神环境和历史变迁，并同时探索在动态中与之进行跨文明对话方式的正面契机（an enabling opening）。在一个专业分工传承非常明确的职业环境中，他所注重的跨学科变局，吸引了极为广泛的热情、兴趣和批评；他曾主持设在康奈尔大学的“全美理论与批评高研院”（School of Criticism and Theory）十二年，高研院充满了各种批评和论辩，汇聚着欧美确实是最为才华横溢的各年龄段的学人。我由此进入了人生中大量阅读和开放论辩的第二个高峰期，并于二十年后的2006年，被邀为高研院的教授。

○ 那么，您的文学研究是如何在这种环境中进行的呢？

● 在今天，文学及其研究不限于既定固化的范畴定义，这大致已是一个共识，甚或是常识。在我们当时的跨国之旅中，还有一些具体的历史和人生内容。一个人文学者，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沿着学科制度所设置的以原母语文本为研究典籍的职业通道，以其中具体的某一种样式——比如小说或戏剧——为职业之舟，当然是可以的。那时候为数不多的中国人文领域的留学生，赴美后多数进入东亚系研究中国文学，毕业后亦多数在东亚系就业。尽管东亚区域研究，在美国自1950年代建立以来，有着制度性的问题和观念上带来的限制，但人的能动性仍然会发现和拓展自身活跃的空间，尤其是就

其中诸多优秀的学人而言。同时，当一个以人文研究和意义开拓为本务的学人，从一种文明环境和精神传承进入到另一种文明环境和精神传承，即便以某一种文化样式为精神旅行的具体载体，也无法不产生强烈的对于不同文明起源、底蕴和差异的总体性叩问和探求。我是中文系出身，这一种体验可能就更强化一些。当我本着中国文化的传承进入欧美文明主脉，对不同的文化样式直至生命形式作为问题本身就产生了追问——欧美文学的起源及其流变中的精神底蕴与我们的历史差异，确实是必须面对的。比如我们要了解欧美文明，对这一文明渊源的原典就需要了解，就要了解各版《圣经》及其弥漫在文字语言中的存在；这就使得专业意识成为了问题本身，比如追问什么是文学、文学性的特殊功能构成和普遍价值变迁，等等。这是为什么说跨学科的综合空间，对我不仅具有专业创新方面的吸引力，而且是提供了跨文明心智能力扩展的路径。我的博士论文选题，在某种意义上，是记录也是处理这一类追问的一个尝试。论文以贝克特《等待戈多》的作者，在终其一生的英法双语小说、戏剧、诗歌等写作中开启的审美界域以及他同时代先锋派艺术家群体构成的星座为研究对象，聚焦理论批评界在这一审美界域中对基督教文明现代变奏根本叩问的处理、从内容到形式将其经典化的方式，对“二战”后欧洲文明的价值危机和经典重构的历史过程，做了一次勾勒和探讨。

○ 您是说《等待戈多》所引发的审美是建基在叩问重估《圣经》这样一个背景上？

● 简单而言，我是说包括《等待戈多》等经典的先锋派审美，是一种对基督教神学及其世俗化过程的深度呈现和深度反思。我的论文是对这一深度呈现和深度反思及其经典化的探索；通过探索，以期对我们通常称之为“西方文明”传承中的主流脉络和内部重构动态，获得一种具体的感受和理解，甚至某种智性的把握。

○ 也就是说，对《等待戈多》等艺术作品引发的审美进行探讨，实际上是对西方文明主流脉络的梳理，是吗？这是您这七年中学得最多的东西，您由此去认识西方，而且是从根子上去认识的？

● 现代欧洲文学艺术和思想史是我硕博阶段的专业领域，对专业领域所属的文明源流和传承主脉，需要了解和把握，这是专业要求，至少是我的

愿望。是否做到、做得如何，自然是另外一个问题。博士论文的完成就是习作的完成，与习作《秦王李世民》同样性质。因为书写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通过学习写出来，也通过书写来学习。虽然是习作，但都不是一个从书本到书本的学习和写作过程。也许我应该在这里提一下，我从读研的第二年起，成为康奈尔大学校园里“Telluride House”的成员。翻成中文，或许可以叫“Telluride 书院”。这是一位工程师科学家在1910年主建的以教育创新为主旨的基金会所属三个书院中的第一书院，成员包括通过三重竞争被挑选的康奈尔大学本科生，从世界各国来美研究生中挑选的“优异生”，从本校挑选的青年教授，和从世界各国来访教授中挑选的资深学者。整个读研岁月，我是在这样一个书院里度过的：每周需要做公开讲演，每晚餐桌上都有讨论，且常常持续到夜深，或是第二天、第三天、第N天还不能结束，半夜咖啡提神或凌晨面包充饥，在餐厅图书馆会客室钢琴房都会遭遇论辩；有时会有真正的见解分歧和有后果的思想冲突；一日三餐时常会遇到世界一流的学者、作家、艺术家、社会公益活动家……如此“同吃同住同论辩”，理念、行为、思考、生活，好像同时打开的活书，我天天参与和阅读。其中的经历和记忆，也许另外有合适的时候回顾反思。

○ 对这样一种主流环境的深入，是否也是因为您一直想要把握主流文化的重心；出于同样的原因，您毕业后不想进入东亚系？就如《秦王李世民》处理的唐朝，是中国传统里面最辉煌的部分；您到了西方，也要深入其最根本、最核心的部分？

● 十幕史剧《秦王李世民》意在重访和探索中国古典文化中的现代性资源；对话古典，就是更新古典。博士论文《贝克特诗学：战后价值危机和经典重构》意在体验和把握西方文明现代世俗化过程中全局性裂变期，价值传承的危机和历史经典的重构；价值危机审美，就是经典传承再造。在现代世俗化过程的湍流区，不同的文明传承如何在巨变中更新价值和重构经典，成为我在此之后所有学术和非学术人文实践的母题。这直接关乎我从童年一个人的读书日子里开始的解惑追索。就专业本务而言，一直存在心里的，是在我的理解中，由创立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第一代国际化学人开始所示意的学术路标。他们尝试深入认知并把握现代西方最精华的部分，回到祖国后创造性地使用所学精华以更新中

华文明的命脉；以各自的专业重点相互配合，开拓思路是中西合璧，内涵上是双重创新的中国人文学、人文文化发展道路。这条路当然不是现成的；所谓“路漫漫其修远兮”。所有这些奠基人、开拓者，都对不同的文明体系通过极为艰苦的学习，获得某种整体性的把握。这里的艰苦，不全是通常的“刻苦”或“苦读”，而是一种突破自身局限的智性斡旋和开启，获得根本上是跨文明的心智扩展的艰难远征；人最难的是认知、挑战和超越自身的局限，以获得生命的开阔和人性的提升。那样一种艰苦历程，其中的不同经验和成败得失，在中国文化发展史的研究中还有待更多面的认知。

回到执教领域选择。关于东亚系的局限，前面已经提过。我从一开始的领域定位就是比较文学、戏剧研究和理论创新。那时的比较文学系科里，没有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全部设在东亚系。比较文学领域建构的学理奠基，往往追溯到歌德提出的“世界文学”的理念。就具体实践而言，在美国高校系科发展的历史中，比较文学领域从业人员主力的构成和提升的转折点，是在“二战”和战后，美国不仅容纳而且积极地汇聚了离开纳粹欧洲、被迫流亡的大批知识分子。比较文学作为一个精英领域，从学科组织构造到学术实践生态，既充满优秀的人文学养、精神氛围，又顽固携带着欧洲中心主义的胎记，其历史成因和内涵与欧洲作为全球文化制高点如何移位、美国如何飙升、世界各国和地区如何重新界定等全局问题内在关联，这是另一个话题。在这样的领域环境中，我的学术开拓一开始就必须包括“去欧洲中心主义”的坚定努力。所以我执教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获得课程设置中必修专业理论课的教学资格和地位；而在理论教学中，包括了对领域属性、学术范畴和历史构建的理论化反思和新命题设置。提出的第一项改革方案，是在学科设置中包括中国文学和艺术。要言之，我的“教学（教育和启蒙）对象”必须包括所有的同事、系科人员、行政系统、学术社团、刊物杂志，必须包括我所到之处遇见的所有人。1992年，当我第一次教授“中国戏剧”课程结束后，意外地收到第一次接触中国议题的学生全体送上的一大捧鲜花，和一张印着中文“谢”字、写满了学生签名的卡片。这张二十二年前收到的卡片，我保存至今。

○ 您在比较文学和戏剧系除了教授传统课程，

为美国学生加入了中国文学和艺术的课程，主要是讲哪一段？执教以后，您的研究是否就是以您前面所说的“母题”为重心，中西领域，双重开展？

● 是的。从具体时段来说是现当代，主要是现代；讲授中国现当代文学和艺术，当然必须有古典经典的入门部分，必须包括对不同文化的历史意识的培养，必须有内在的与现代欧美的比较参照，在润物细无声中，引导学生理顺自己与所学内容的跨文化、跨文明的正面关系；最佳的教学效果，是与学生一起探索作为世界史意义构建中不可或缺的文化中国及其现代命运。

○ 无论如何，还是回到中国——“把别人好的东西学到手，来更新我们的事业”？

● 这是朱东润先生在上海、在母校对我说的话。我当时身在美国，那样一种环境中的心智状态，没有朱先生原话中的超脱。人在其中，有一种具体的、强烈的、强化了的情感感受，就是我们的现代文化艺术有价值，但是在欧美的环境中，这个价值不可见、不可感、更难以被认同。

○ 是对您的价值认同还是……

● 由于我的硕博专业是欧洲欧美研究，又始终主持必修的专业理论课和开设一系列其他课程，对“西方文明”我有着远远超出职业所需的关注强度和对新意阐释的追求，对“论辩”这一交流方式也有由衷的欣赏和天然热情，这些因素使得我个人，作为专业教授的存在和价值，是可见的、被承认的，甚至是十分受尊重的。最困难的，也不是对我坚持同时教授“跨文化”“非传统”的中国课程的阻力；事实上，中西文学比较类的课程，相当快速地被接受，而不再是“第一只螃蟹”。我个人获得的支持一路上升、越来越多。

○ 那么，最困难的是什么呢？

● 在参与主流学术共同体的重要讨论、学术论辩最酣畅的时候，智性才华竞争最为激烈平等愉快、参与者们忘了我的中国背景、对我完全“承认”的时候——这种时候，对“中国文化”的礼貌性提携、“个案”性涉及、“注脚”性使用，在不觉中完全凸显，“文化中国”事实上蒸发消失。这是我在美国学术人生中最感困难的时候。

○ 您是说，在他们的文化版图中，中国文化是被忽略的，在他们的认知结构里，中国文化是边缘的。

● 在现代意义的王国里，在世界精神的编年史

中，文化中国“被”缺席，方式多样。大家比较多谈到的历史上的例子，是黑格尔在他的精神现象学论述中构建的世界精神的历程和版图中，没有中国文化中华文明存在之地。马克思对中国的现代命运有着最为深刻宽阔的伦理关注和同情；但谈到中国的组织形态用“亚细亚”来代替命名——“亚细亚生产方式”。亚细亚是一个区域，不具备理念属性，不指向价值系统，不开启意义生产。

○ 它只能当成一个事实存下来，而不具备文明上的意义。

● 一种物质事实，但跟历史、意义、真理无关。不能进入认知框架和逻辑机制，不能进入由这个逻辑产生的价值系统和意义生产。犹如以社会性别化的逻辑去看男性女性，男性的一生关乎造就意义，女性的一生关乎自然繁衍。认知逻辑内在地安排价值形式及其等级秩序，因此对于这个等级秩序本身，从其显性的社会政治效果的层面去反馈、去批评——比如文化偏见、意识形态等——是不够有效的。现代以来，我们被这个认知系统所影响，一直以来还不能说对此有充分的自觉、主动的把握和更为有效的处理。如何将文化中国纳入世界意义版图核心区域的问题，同时是如何对话、叩问甚或是超越世界意义版图得以构建的认知逻辑的问题。当时我对此未必能够有所表达，但表达的愿望很强烈，表达本身也是个实践为先的动态过程。

○ 所以您是希望，在自己的中国文学研究、教学中，能使得它的意义价值被发现，具有一种世界性，能让另一种不同的文明认同。

● 未必是认同，但要成为时代界定性话题设置的核心部分，不可少的根本部分。任何关于现代世界的历史认知、价值阐释和意义论辩，如果文化中国或是缺位或成为各种样式的“注解”，在逻辑上不成立。

○ 所以您后来的学术就致力于这个方面，就是用不同的方法或通过不同的认知路径，来研究中国文学，来发掘其中的意义？

● 只是尝试。回到此前你问到的《现代中国女性作家和中国革命》这本书的写作。书写得比较早，是在美国的语境中进行的。201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此书中文译版；之后国内同行十分善意地数次讨论，携带着国内语境大量的信息，带来的是一种内涵密集的跨语境体验，我在听、在学习。就我

当时写作过程而言，对话对象包括了前面提到的欧美主流学术共同体。我们了解，现代西方主流精神领域的开启和构建，走的是一条从宗教信仰秩序到形而上学思辨的通道，以本体论、认知论、伦理学、审美学的理念、范畴和体系的创建，取代宗教教义对人的世界观的制度安排。我通过对现代中国女性作家想象写作和实在人生互动开启的意义探索，意在具体勾勒内在于中国文化的现代认知、伦理和本体意识的生成轨迹，与现代西方的主流传统形成一种隐性的互动对话和批判论辩。在理论的层面上，探索的是在近代世界史上最为险峻严酷的一段湍流时空里，一种现代中国的认知方式、伦理感知和生命本体意识，是如何通过审美践行而氤氲生成、以及氤氲中千变万化的形态，生成深重辽阔的内涵。简言之，“中国现代女性作家”是一个动态的命名过程，这一命名以物质的身躯为承载，以中国文化传承内生的流变为能量，在不同文明遭遇、交锋、交融的裂变中，指向一种创世记般的现代生命孕育和成形的历程，对现代性的意义世界和现代人性本身，提供还有待认知的想象和力量。

在这里，也许应该提一下我自90年代以来，对所谓的“发展中国家”，主要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英属非洲的文学艺术，比较系统的研读。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即所谓的黑非洲。我对黑非洲的一些优秀女性作家特别欣赏和看重，她们用英文写作，因为受的是英国教育。我有一些曾经的师长和长期的友人，包括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剧作家索英卡，是世界文学的精华部分。我自90年代中后期起发表这一方面的研究文章，其中《跨国性：战后诗学中边界地缘的叙述喻象》和《跨界体现与女性人间》或可一提，因为对我自己的认知能力拓展来说较为重要。目前在国内还没有合适的机会较系统地谈到这方面的工作。

○ 这跟您研究中国文学的意图相近，是吗？她们也不仅仅是物质存在，她们也是意义源泉，但她们的却也一样在意义的王国中缺位。

● 近代以来，英语是国际环境中最为强势的语言。从英属前殖民地历史深处走来的他们，是英语共同体中差异激烈而又最富才华的一部分。当我在中英两种文字语言的交汇处，置身于不同的文明逻辑的谈判中，试图展开自己、想象中国的时候，他们如何用文学、学术、文化艺术来表达自己、书

写人生，成为我的另一种又远又近的回音壁。

○ 这些从英属前殖民地走出的作家，是用了一个强势的他者语言，来表达自己的生活，这有可能吗？

● 如何将这痛苦的悖论化为最为宽广的可能，从他们的艺术作品里，我领悟另一种世界主义的想象，世界主义的人文，如何在沙漠里开花，在无声中长歌。其中一位长者同行，来自肯尼亚，用英语和肯尼亚的斯瓦西里语双语写作；他长期在加州大学执教，是一流小说戏剧作家也是一流人文理论学者。1998年，全美比较文学协会（ACLA）和全美非洲研究协会（ALA）一起开年会，请他作基调讲演。他应邀前来，坐在讲台上，但失声了。一位学术助手代读讲演。基调讲演顺利进行，在场学者都有足够的学养阅历，不动声色，合作共谋，完成这一事件。这是我所经历的唯一没有“问答”论辩一环的基调讲演。个人内心是否有波澜甚或风暴，他人谁也不知道。今天在这流光溢彩的上海，能和你分享这一点记忆，我有点感慨。我们终于摆脱了贫病的时代，处在走出苦难、向往辉煌的时刻，我们正在全世界大规模开展汉语教学；也许正因为如此，在中国梦的表述中，我们可能真的不要特别去强调大家似乎以为必定会使我们地位提升的物质力的权威。我们可能更多的可以谈谈世界文明史中不同而又可以相通的个人和群体，语种和语音，渴望和心愿，历史命运和人文价值特别是亟需交流、交汇、交相呼应的心灵。人类文明的更新，意义世界的扩展，人生时空的延伸，不可能只是同质化的物质财富和资本逻辑的“注解”和复制。

○ 您的这些感受，包括对所谓“第三世界”的关注，是不是跟您的女性性别也有关系？

● 应该说从复旦到出国，我对社会性别意识不是太强，至少并不自觉；主要还是从中国整个近代以来苦难的历史和民族解放的诉求去感受的。这两者之间的关联，我是在以后的学术研究中深入理解，并在《现代中国女性作家和中国革命》一书中做了尝试阐释。事实上，在美国学习和生活了那么多年，逐渐意识并日益领悟到的最为震惊的体验，是一个国家原来是可以这样地拥有如此长久的、真正的和平。美国自独立战争诞生以来，只有一次南北战争，就再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整体动荡；所有美国或经历或发起的其他战争，都完全是在别国、别洲、别一方遥远的土地上。150年的和平，

渗透在整个国家的具体生活、社会基质的所有细节里；而同时，美国又有着极主动、大幅度、无时不在、每日追求的创新驱动和社会活力。我们常说“和平年代”，事实上中国还是在艰难努力地走向和平的历程中。我们的民族记忆、我们的心智深处，真正的和平还在氤氲寻找，还需长远养成。如何完成这样一种文化上的转换，是我们人文学者可做、该做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 您是指和平地去前进去变化，不要动辄有打碎一切的冲动。就是说我们的文明能不能有一种包容的力量，其中包括不断的修正自身的能力？

● 你说得非常好。对于一个近代以来从极端严酷和几乎是灭顶之灾中走出来的民族，这样的心智现象重复出现不奇怪；这是我在美国长期生活后的具体感悟。如何获得和平地去前进去变化的力量，获得不断有效更新和强健自身的能力，是个深邃的命题，内在于前面提到我的人文母题。就当下来说，目前我们面对的文化发展的历史要求，有点像工业革命时期剧变中的英国，或许更有点像“二战”后美国的状态，但我们没有当时美国所拥有的来源于欧洲那样几个世纪的积累。所以大家一方面感到身处战略发展期，非常珍贵；另一方面感到压力巨大。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准备和资源有限。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拥有的是现代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创新机遇。事实上，中国不仅正在全方位地进入国际生活的所有核心地带，而且正在经历世界近代史上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就内涵而言，中国的发展已经超出“中华文明传统”或所有近代以来包括西方在内的现存“发展道路”所称述的范围；中国本身正在成为世界近代史上前所未有的挑战。所以我在一些会议上提出，西方现存的理论，无论什么流派，何种同情，都不能横移过来，套用于中国。我们必须向不同文明的开放中，创新传承。

○ 这些思想积累，是否也酝酿成为您最终决定回国的原因？

● 我的回国决定是在出国时做的。如果不是因为始终要回国的话，在美国的环境里，我所做的一切、包括读研第一学期的选课和博士论文选题，虽然不全是无用之功，但却是大可不必的。你说呢？

○ 或者说是现在各方面都更成熟了，国内有好的对应机构，您也可以做一些事情，就回来了？

● 这个问题特别好，是不是可以做一些事情。

更确切一点的问题，是不是有一些事情需要做。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做了很多事，未必都是一定必须的。但有些事、有些研究，比方说，文化中国和世界历史意义版图的关系，不研究是不行的；这件事是需要做、必须做的。但是任何一个人，并不是必须的。没有你，任何需要完成的事都会被完成。所以问题的内涵就不是关于我这一个了；而是说有这样一类知识经历和知识准备的人，我们需不需要。这个需不需要表现在各个方面。你刚才说的“各方面成熟”指具体机制机缘，可能还包括关乎大局的政策性的机会，等等。但无论是机制还是政策，都不能取代文化氛围和社会的基本精神气质这样一种条件。有没有这样的条件，我还在思考的过程中，还是要通过实践经验、体验和反思来看清楚、想清楚。但有没有这样一种需要，我认为是有的。我们今天谈到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在说有这样的需要。这样的历史需要，和是不是需要我这个人，是两个不同类别的问题，两者没有逻辑的内在联系。

○ 只是这个事情就落在您身上了，您也就觉得应该去做？

● 或者我就继续做。自从自觉到中国的人文发展是自己的本务领域以来，我的问题是如何能够以更有效的方式做好自己的本务，我由衷地希望我的工作能够是有效的。目前还在继续探索。曾有同行担心，我回国后，将减少在美国工作时那样的高度国际性，那一方在中美之间、在一个由欧洲、亚洲、非洲主要高校和国际城市构成的世界性学术空间里施展能力的天地。而我2011年回国至今，在开设本科和研究生新课程和开展其他方面工作的同时，在英国、美国、香港和内地的刊物发表学术文章，英语专著《大迁移》已经初撰。去了两次欧洲、一次亚洲、一次香港做学术会议基调讲演和讲座；自然，还有数次访美。来自拉美的邀请，亦已经两次。时空的广阔有增无减。基于专业学术，又超出了专业的一般边界，与国际环境中的知识界、工业界及其政策制定者们的对话，也仍然延续。2013年3月初访问德国斯图加特大学、海德堡大学和柏林自由大学，10月访问英国雷丁大学、伦敦大学学院和牛津大学，是这延续中的最新实践。同时，困难困惑毋庸讳言，因此花费了不成比例的巨大精力；比如培养一个青年团队，高强度的工作坊做了22次，每次5到6个小时，今年全美比较文学协会年会，他

们成功申报，组委会给了他们三天最好的时段，实属前所未有的。另外不成比例的巨大精力，是花费在和国外多年一路走来、相遇共事的美国同学、同行、同道，在全球环境中曾经交流合作的国际学人的沟通并寻找继续合作的方式。从常春藤盟校辞职回中国，闻所未闻，怎么可以这样做？我第一要使得我的同行接受，这不是一个荒唐的决定；第二这不是一个错误的决定；第三这不意味着我这个学者终结了，甚或还可能是进入一个发展阶段。大致上我最核心的同行友人圈，百分之八十都接受了，而且基本以正面的方式接受，这是十分不容易的。人都受自己的历史条件所局限；要来理解或者说安顿我的这样一种变动，困难在于这会影响到各人对自身的看法，对世界价值秩序和承认框架标杆的基本预设；常春藤盟校的终身正教授，正值人文学术生活的盛年，怎么可能选择到中国去呢？

○ 那是因为您有文化诉求，对吗？您其实是有文化使命感的。

● 使命感说大了。我的家人都在上海。我丈夫2005年从美国先我到上海；我母亲，姐姐，堂表姐妹哥哥弟弟，还有子侄辈，大多在上海、在江南。就我自身而言，可能有三层比较具体内在的因素。第一，是自爱，我的文化渊源我爱她。爱，和喜欢不一样，爱无法选择。第二，自重。换个说法，就是对意义的坚持和求索。我们的本务，所有选择人文学术为生活之舟的人的本务，根本上是意义的生产和求索。以英语的语境和西方的逻辑来理解，也就是在所谓的英语-西方文化共同体之中，没有意义的人生是不可辨认的、无法存在的。黑格尔的历史观，就是意义人生得以成就之路。没有意义的人生，就是没有历史的人生，就是非人非生。第三，是自尊。民族的自尊。长期在国外生活，确认即便是经

济全球化时代，民族是实存的实体，不可一日无自尊。与其在国外焦虑民族如何匮乏或不知如何获得自尊，不如在国内尝试做一点增量。这三条，是母亲自小教给我的；不是女性独独需要，但跟社会性别确实有关；尤其是其中第二条。在豆蔻年华的记忆中，我一直有个疑问：有些喜欢我追求我的男孩子，对我很关注、很在意甚或很珍视，但对我最为在意的我的工作，也就是我的生活的意义，常常不珍重、不在意。为什么？读本科时，班上有男同学写剧本，让我去演出剧本所规定的角色；理所当然地认为这就是对我的看重看高；为什么没有人会想到，我也许是自己写剧本，而不是上演别人为我设定的角色呢？

○ 很精彩。这也是人文知识分子很朴素的一些东西。

● 是，我的天性是朴素、单纯的。年轻时对此不自觉，险象交错之中，依然看到阳光；跨国岁月、在太平洋两岸的长年磨练，终于对此有所自觉之后，就把朴素单纯作为人生的追求。朴素不是无知，单纯不是幼稚。歌德曾说，生命是阳光，而阳光就是单纯的。一个人终其一生专注地做一件事，倾听一件事的呼唤，任潮涨潮落，任枯荣沉浮，也是这个意思。在这个世界上，守望朴素，守望单纯，守望生命，自然并不容易。所以恩师朱东润先生说，不要挑容易的路走。这句话，很朴素，很清晰；在我的心目中，是暗夜里长燃的灯火，是风暴中不灭的光亮。有生之年已经不多，我希望和朴素的朋友们，继续一起做一点朴素的事，在日常的相遇中珍惜相互的生命，珍惜生命的深邃本源和宽阔流变，珍惜生命的阳光。

（本文根据上海社会科学院刘春的录音整理稿编辑而成）

（责任编辑：晴西）